本书回顾了苏联的最后一年，作者亲身经历此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大的地缘政治地震，掌握有许多一手资料。从一般的政治光谱来说，作者的立场是倾左翼的，但作者在本书中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评价以及苏联崩溃原因的分析，并不失之于偏颇，观点整体上站得住脚。

作者麦德维杰夫并未将责任全推给戈尔巴乔夫或这一代的领导人们，苏联的腐朽是系统性的问题，苏联不是不应改革，苏联解体不是民主化突飞猛进的结果，而是这个进程整整晚了二十多年。早在斯大林去世时就应该开始的改革，却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领导人才有勇气去着手调整这艘积重难返的巨轮，但戈尔巴乔夫本人却并无能力实现他所期望的目标（戈氏的目标也十分不清晰，只有大体的轮廓），“戈尔巴乔夫不具备‘伟人’的个人品质，但他却从事着一个伟大的事业”。作者的上述观点，应该说是公允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苏联的失败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如同作者说的，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已变成了极权主义的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这些大抵也不错，但作者暂未深入地分析何谓社会主义，或者说，北欧模式是否才是更符合马克思本人所设想地社会主义。固然，斯大林时代便已可以清楚地看到对社会主义理想地远离，但这个根还要往列宁那找。

社会主义的理想是要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人类更好的一种社会形态，但无论是苏联还是俄罗斯帝国，生产及生活水平尚不能与所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何来“超越”资本主义一说。相较于斯大林或毛泽东，列宁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奉献与执着的信仰要值得肯定，但也正是列宁理论中犯下的致命错误为后来的诸多灾难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倘若列宁的理论成真了，马克思列宁指导下的苏联真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那不啻于发明了永动机，既然可以从不发达的甚至尚未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直接迈进社会主义，那还要资本主义这一阶段有何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的失败恰是马克思理论的胜利，至少在苏联的历史上看，“理念”（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能战胜或取代“物质”（苏联的客观经济、生产水平），这也是列宁主义的自我矛盾之处。

关于中国如何看待苏联解体的问题也同样有趣，麦德维杰夫赞扬邓小平改革努力的成功。但讽刺的是，或许正是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又亲手关上了改革的大门。转了一圈，我们又回到了76年以前的心态，只不过是在更好的物质经济条件下，也看起来没有那么紧迫的压力。这从官方教材中可见一斑，将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只要不揭开伤疤仿佛问题就不存在，就不需要解决。这不过是在重复苏联的覆辙罢了，只不过还没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时代而已。